



南新街上的那些文化人

□ 田可新 王碧薇



南新街的模样也在悄然变化。摄影/田可新

南新街54号

一九三一年暑假，老舍回北京和我结婚。婚后，我们一起回到济南，在南新街租了一所小屋子，当时的门牌是54号。在这里，我们住了三年，生下了舒济。

南新街就在齐鲁大学的北边，是一条有个折弯的南北胡同。我们住的小院子，大门坐东向西；二门内的西、北、东三面有房；紧靠大门洞的门房由老田夫妇住着，西屋两间是大家吃饭的地方，东屋是厨房，厕所在东南的角落里，我和老舍住北房。北房是三间，实为三间半，西山墙后边还连着一个暗间，堆放杂物。北房的东边一间半加了隔断，作为卧室；西边一间半，是老舍会客和写作的地方。他的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赶集》中的绝大部分短篇小说，如《大悲寺外》、《绝大先生》、《微神》、《开市大吉》、《歪毛儿》、《柳家大院》、《抱孙》、《黑白李》、《眼镜》、《铁牛和病鸭》、《也是三角》等，还有发表在《论语》等刊物上的幽默诗文，大都写成于这间屋子。当时，他的书桌就在西间的南窗下。

齐鲁文脉

林语堂版“泰山旅游指南”

□ 张 鹏

《京华烟云》是林语堂旅居巴黎时于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间用英文写就的长篇小说。林语堂原本打算将《红楼梦》译作英文介绍给西方读者，未成后决定仿照《红楼梦》的结构写一部长篇小说，于是写出了全景式展现了现代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历史风貌的《京华烟云》。《京华烟云》中有专门章节涉及男女主人公到泰山游玩的记述。

泰山是我国的“五岳”之首，有“天下第一山”之美誉。泰山于1987年被列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名录。数千年来，先后有十二位皇帝来泰山封禅。在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孔子留下了“登泰山而小天下”的由衷赞叹，杜甫留下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千古绝唱，姚鼐则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著名散文篇章《登泰山记》，无数诗词歌赋给予泰山以钟灵毓秀的人文色彩。

在书中，林语堂饶有兴致地叙写了男女主人公游览泰山的详细过程，对于我们了解民国

时期的泰山文化颇有价值。

“坐火车在七月天回北京，是够热的。他们决定在曾家故乡山东泰安稍停，乘机会一游东岳泰山”。这是《京华烟云》第十部分写到的登泰山的缘由。林语堂写到了泰山登山盘路宽阔、石阶铺砌平整，爬山感觉舒适。林语堂认为，在中国，若论登山的路径宽广、铺砌得好，石级道构筑得好，爬上去感觉到舒服，只有东岳泰山。在过去，登泰山的路的保养维护，一则来自政府的经费，一则由私人捐献，才使宽广的石头路一直完好整齐。林语堂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过去两千年来，皇帝屡屡举行封山大典，以示对泰山的尊崇；多少世纪以来的诗人，好多作出诗歌，赞美泰山，刻在岩石之上，一直留至今日。历史渐久，古物渐多，民俗传闻亦渐丰富，香客的故事口耳相传，越使圣山生色。

登山者从“孔子登山处”的“第一天门”，经过半途中的“第二天门”，一直到山

在省城的文化西路上向西漫步，绿树成荫的道路车水马龙，几家医院和山大西校区皆位于此，让这里多了不少的喧闹，甚至走着走着，常会听到有人抱怨“车多”“人挤”。可是莫急，耐心地前行上一会儿，拐进一处极不起眼的街口，便会立刻的沉静下来，惬意地享受一份安宁。

这儿就是有名的南新街。在“老济南”们眼中，可是个历史味道重、文化感觉浓的“宝地”。比如众所周知的那牌58号的几间瓦房构成的小院，便是大作家老舍先生的昔日居所。而同住过这条巷子的政要、名流可还有很多……

老街洋房里的明义士

南新街56号曾有一座花园洋房。而住在这里的便是有着“甲骨研究西方学者第一人”之称的明义士。

明义士，原名孟席斯·詹姆斯·梅隆(Menzies James Mellon)1885年生于加拿大，大学毕业后到神学院进修，1910年以牧师身份来到中国河南传教。在安阳，他接触到了甲骨，并投入地研究了起来。1917年，其编著的《商代文化——殷墟甲骨》一书收录了甲骨2369片，是欧美学者出版的第一部甲骨著录书。

洋学者何以和南新街“有缘”？原来，因为在甲骨研究、考古研究方面有很高的造诣，1932年，他被聘为齐鲁大学的考古学教授，教的便是《甲骨研究》、《考古学通论》、《人类学与考古学》等课程，便住在了这条街上。

“大花园小洋楼”，这是一些南新街的老人对明义士故居的印象。据说，那独门独院的居所，楼前有个养鱼池，院内四处郁郁葱葱，在绿树、鲜花的映衬下，总透着一股幽静与雅致。

明义士还和老舍做了几年的邻居，有过一定的交往。已故的济南文史专家张昆河先生曾修过明义士的课，他撰文回忆，当年登门拜访这位洋老师时还见到过老舍，他书桌旁摆放着铭器、古籍、外文洋装书，更有一本老舍的长篇小说《离婚》格外显眼，那是老舍亲笔题赠的。

明义士在这里住得并不长，1936年，他离开齐鲁大学开始休假。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此后便再也没有重返中国，后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人类学教授，1957年逝世。据统计，明义士所藏甲骨现存世36097片，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山东省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等地。1999年，明义士次子，曾出任加拿大驻华大使的明明德将明义士生前收藏的包括金石拓片、照片、书籍、信件、日记、手稿等大量重要研究资料捐赠给了山东大学。

宽厚淡薄的“虫家”黑伯龙

“黑伯龙先生是我上学时的老师，他住在南新街67号(原71号)，和我住过的81号是斜对门。黑先生为人谦和，待人诚恳，诲人不倦，特别是在笔法上的示范，使我获益良多。”今年72岁的退休干部陈维鹏这样评价这位“老街坊”。

黑伯龙，生前任山东艺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美协副主席、山东画院院长、齐鲁书画研究院院长。他自幼喜爱书画，曾受赫保真、赵望云等诸师的启蒙教育。20岁入上海美专学习，得汪声远、潘天寿、黄宾虹诸家真传。由于勤奋颖悟，很快在美术界崭露头角。他注重传统，师法自然，确立了奔放雄浑的写意风格，使自己的写意山水独树一帜誉称于世。晚年善画苍松古柏、顽石劲竹、高山飞瀑、叠嶂烟云，但不



明义士

是自然主义的再现，而是删繁就简生动洗练地描写物象，以神写形，以形传神。

到现在，陈维鹏对黑伯龙给自己做书法点拨的场景还有深刻印象。“黑老师住的是平房，有一间专门的屋子用于书画创作，房间里有一张大桌子，摆有文房四宝，宁静淡雅。他认真地在桌上铺好纸，写下黄庭坚的行书为我做示范。”陈维鹏说，这样的教学是常有的事。对于自己这种经常性的登门求教，已经赫赫有名的黑伯龙从不厌烦，总是随和、耐心地进行着指导。

而这种随和、豁达还反映在黑伯龙“玩虫”的爱好上。黑伯龙有一个独特的称号，那就是“虫家”——他尤爱赏玩秋虫，这在省城南关一带，可是远近闻名。对于拿虫换画，黑伯龙也从不吝嗇，有的玩虫行家就逮着蟋蟀来换他的作品，他都乐得大方送出。而这个“虫家”更爱画虫，听说他曾画过一幅《秋兴图》，将蟋蟀描绘得栩栩如生。

平易近人的大师方荣翔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方荣翔先生原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京剧团主要演员，1958年志愿军回国时随团转入山东省京剧团。起先住南新街53号(原57号)，上世纪60年代中期搬进上新街徐家花园45号(已拆)，70年代初住上新街120号，两年后又搬回南新街居住，直到1989年4月去世。

“最初，我们家9口人住在南新街两间平房里，日子过得挺艰难。”方荣翔的女儿方丽莉回忆。最苦的时候，她的奶奶要拿着秤把口粮分好，即便有口细粮馒头，也要掰开分着吃，省着吃。“到了三伏天，6个兄弟姊妹就在床板上一个挨一个地躺下，而父亲下了戏再晚，也要拿着扇子，在一旁默默地扇风。”方丽莉说，和许多平常人家一样，他们这个大家庭也充满了这种虽然艰苦却很温馨的记忆。

在那条街上，方荣翔对戏的痴迷人尽皆知。和他住过同一个院的邻居说，方先生在艺术上千锤百炼、精益求精的精神感染着他们每一个人。“在他房前小院内，你随时可以看到他一招一式进行不懈地研究。当初他住的是平房，由户内到户外的里出外进中，常见他‘念念有词’或一遍遍的练唱，达到了忘我和痴迷的程度，以至于我们从他眼前经过都浑然不觉。”

而生活中的方荣翔说话轻声慢语，为人行事低调，不事张扬，又是极其谦和、内敛、平易近人的。“见到挑粪工人，他总是主动走上前去握手，不断嘘寒问暖，遇上街里街坊的，更得热情地聊上一会儿，情之所至，还会开嗓唱上一段，丝毫没有京剧大腕的架子。”

方荣翔的家“人气儿”很旺。这里常有同住于南新街上的政要、名人前来小坐，也有来自天津、四川等地的徒弟在这里吃住、学戏，还有梅葆玥、梅葆玖、尚长荣、尚长林等名角前来探望，更有大批戏迷慕名而来。“那时，家里就断不了来访的人。”方丽莉说，还有十几岁的小戏迷从外地一路找来要拜师学戏，父亲总是劝说其回去先进学校学习，再给上路费，塞足吃的喝的，嘱咐着“一路小心”……这样的例子可是数不胜数。

时光荏苒，如今南新街的生活正一点一滴地改变。面对这样一条文化老街，人们应当做些什么？或许应在懂得珍视的同时，学会怀着崇敬的心去了解、呵护，告诉更多的街外人、后来人，这条街上的这些人，这些事儿、这些精神。



方荣翔

兵学奥秘

有实力才谈得上智慧

□ 赵海军

取得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呢？这是研究战争必须面对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后人说，孙武尚智。这话没有错，但不够全面。在孙子看来，智与力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在战争中是缺一不可的。决定战争胜负最根本的因素是实力。

诚然，历史上总有弱小的军队战胜强大的敌人，但这不是说智慧比实力更重要呢？当然不是。孙子告诉我们，实力是进行战争的基础。如果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靠什么去打仗呢？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你的计谋再好，靠谁去实现呢？实力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孙子单独立了《形篇》来讨论战争实力问题。在孙子看来，真正的智慧，是建设实力的智慧，是巩固实力的智慧，是运用实力的智慧。只有这样的智慧，才能称得上是大智慧。如果离开了实力谈智慧，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充其量也只是小聪明而已。

怎么发展自己的实力呢？孙子认为，首先是要修明政治，保障法制，以加强国家的综合力量；其次是要发展经济，保障战争的物资供应；再次是要加强军队建设，任用优秀的将领，搞好军事训练；最后就是通过战胜敌人来发展壮大自己。这便是所谓的“胜敌而益强”。

战国时期，各国为增强实力，相继进行了军事改革。秦国之所以能击灭山东六国，统一天下，究其原因，最根本的一条在于得益于商鞅变法。与其他各国人在法在，人亡法亡的情况不同，商鞅变法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后来商鞅虽遭车裂，但其变法的成果犹在，从而使秦国国力不断增强，奠定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基石。

西汉初期，连年战争，经济遭到巨大的破坏，面对匈奴的内犯，汉高祖刘邦倾全国之力迎战，结果在白登被困，幸赖陈平设计，才脱离危险。后来西汉意识到自己的实力不足，转而采取和亲的政策。后经文、景之治，西汉通过几十年的努力，着力于发展经济，致使国力大增。特别是西汉朝廷采取了鼓励养马的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终于建立起了一支足以与匈奴抗衡的骑兵部队。至武帝时，西汉终于开始战略反击。可以说，正是几十年的实力建设，铸就了汉武帝北击匈奴的辉煌。

至于实力的运用问题，则是整部《孙子兵法》要讨论的主体内容。孙子提出的诸如强攻弱守、避实击虚、出奇制胜、兵贵神速、积形造势等兵法原则，都是围绕着实力的运用而展开的。

必须看到，关于战争中智与力的关系问题，后世兵家多有走入歧途者，致使诸如“贵谋而贱战”、“攻人以谋不以力，用兵斗智不斗多”之类的种种论调大行其是，成为传统军事文化中的一大弊端。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将《三十六计》等同于《孙子兵法》。孙子将实力看成是运用计谋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见解。没有实力做基础，任何事情都是做不成功的。

应该看到，随着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战争形态也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从春秋时期的车战，到大规模骑兵集团的运用，再到机械化战争和当今的信息化战争，军事领域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无论战争形态如何变化，实力的建设永远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基础，这一点是永远不会变的。

群贤毕至

珠算始祖 莱州徐岳

□ 文 溪

徐岳(?-220)，字公河，东莱掖县(今莱州市)人，东汉时期著名数学家、天文学家，珠算研究的始祖。

相传，徐岳自幼聪慧，刚入学就对算术显示特有的兴趣。先生扳着手指教他10以内的加减法，小徐岳偏在石板上划杠指数增减；后来，索性找来一捧小石子，上下9颗为一行，满10进1或减1退9，果然较之扳手指和石板上划杠，既直观，又快捷，百无一失。先生见此很惊异，撩起长袍也加入“玩石子”的行列。他们先在地上划出一道横线，下面每行排5颗石子，横线上1颗作5，这样运算起来又快又准。这似乎就是“串珠算盘”最早的雏形了。

汉灵帝时，著名天文学家刘洪创造了“乾象历”，授于徐岳。徐岳通过潜心研究，进一步完善了“乾象历”，后又把该历法传授给吴中书令阚泽，遂在吴国实行。他搜集先秦以来的大量数学资料，撰写出《数术记遗》、《算经要术》等数学著作。《数术记遗》载：“珠算，……刻板为三分，其上下二分以停游珠，中间一分以定算位，位各五珠，上一珠与下四珠色别，其上别色之珠当五，其下四珠，珠各当一。”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徐岳是第一个提起“珠算”概念和记载算盘样式的，所以说他是珠算始祖，当之无愧。

此后，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算盘传播到日本、朝鲜、俄国和欧洲各国。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记述：“欧洲出现算盘大约在三四世纪，中国人应用算盘就比欧洲人略早一些。”算盘的发明与应用，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又一贡献。

□ 责任编辑 于岸青

山的中路，东西桥至壶天阁下，长达200多米的盘道两侧，可谓泰山用侧柏作行道树的先例。浓荫蔽日，人行其间好似进入洞中，盛夏时很是凉爽。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张珩题“柏洞”二字刻于路东岩石上。

过了“十八盘”，“南天门”在望，在几乎垂直的悬崖之上，如危楼耸立。中间凿劈为门，有石级可登。轿夫现在将轿子斜着抬进，这样，前面的轿夫就在右边走，后面的轿夫就在左边走，因为石级太陡了。到了南天门，他们下了轿，顺着“天门街”走向“玉皇阁”，那是山上最高之处，就预备在此处过夜。一个年约十七八岁的小道士，出来迎接他们，这院大家都立在石头铺地的庭院中的阳台上，庭院是围着一块拔地而起的巨大岩石而建，那块岩石据说是全山最高的岩石，叫泰山绝顶石。他们还看到了秦始皇的无字碑。次日凌晨他们一行到“日观峰”观日出。岱顶观日历来为游人所向往，也使许多文人墨客为之高歌。林语堂也不例外，用了近千字大大地描绘，大大地歌颂了一番。应该说，林语堂对主人公登山历程的描写是现代文学中最为全面的，几乎将泰山的主要景点都囊括进去了。

公允地说，这次泰山行踪，简直就是一篇详细的泰山旅游指南。